

# 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观的 内在逻辑与实证检验

## ))) 透过转型对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再认识

靳 涛

**摘要:**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各方面制度演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着重揭示事物的本质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sup>①</sup>。马克思根据各利益集团在社会生产体系中不同资源支配能力划分出各个阶级,马克思的社会制度变迁的革命理论就是建立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基础上。本文的实证研究也证实,转型和制度变迁的内因取决于社会各级主体对新制度的预期效用变化和在利益驱使下所表现出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转变也支持了这一点,这充分说明用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分析方法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演进(转型)比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是更贴切和合理的。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思想;转型;再认识

**中图分类号:**F0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6)03-0070-08

### 一、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观内在逻辑的再审视

#### (一)对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观内在逻辑的认识

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作某种先验的超历史的现象,这是西方古典主流经济学从亚当·斯密以来就形成的一个传统,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的产物,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和前提;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在自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而是人类本性的必然。那么这样一来,私有制就是人类利己本性的自然体现,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是永恒的。马克思在承认生产的任何时代都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和规律,但所谓的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一些抽象的要素,仅仅用这些要素无法理解一个现实的和演变的某一特定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般的生产,而只有在一定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只有对在具体生产力发展条件下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才有现实性和历史意义,而古典经济学家的缺陷就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认识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而且还深刻分析到:“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

**作者简介:**靳涛,经济学博士,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视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sup>②</sup>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做出判断。”<sup>③</sup>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诊断,他首先从商品、货币开始研究,然后从资本主义的简单再生产到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从商品生产到商品交换,从资本到剩余价值,最后分析到了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并认为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力量会不断壮大,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必然代替人剥削人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分析的关键,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它在整个经济关系的体系中起决定作用。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决定作用,又是由生产在人类全部经济活动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

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个理论框架来看,其逻辑体系和逻辑结构是非常清晰和前后一致的,他所有研究的出发点都可以归结在揭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内在机理方面。他的唯物观和辩证法是揭示人类社会变化和发展的工具,其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案例来具体剖析,并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体现了他的历史视角和社会责任。《资本论》的研究可以看成是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很好地验证和支持了马克思的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和历史唯物观;他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测和认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的整个经济思想体系都是以说明和揭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研究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 (二) 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发展观的表述

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始终认为一切历史(经济社会)变迁的最终原因,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从未深入地给出一个理想的回答,而古典经济学家更是不能对社会制度系统的发展演化给出一个系统的理论和框架。在马克思之前,把经济社会的演化作为研究对象并融入经济分析之中是没有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视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sup>④</sup>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之上,第一次对人类发展的演化进行了系统和辩证的演绎。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一次对制度变迁的原因进行了客观的政治、经济分析,并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工和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所带来的生产潜力却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结果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组织(阶级)去替代现有的体制并创立能把新技术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新型产权形式。马克思认为,在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制度演化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把下面的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sup>⑤</sup>这段话清晰的说明了马克思将人类社会的演化归功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不是将其归功于文化、观念和意识的改变,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制度变迁的技术决定论。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的理论及诺斯和哈耶克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诺斯、特别是哈耶克似乎是更看重后者。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上社会制度变迁的不同模式,实际上也就是与生产力的

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即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社会分工和生产工艺的进步,而其所带来的生产潜力却不能在现有的经济组织中得以实现,生产潜力和产权关系的矛盾使的新的生产关系(产权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产权关系),推动社会制度的演化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制度,即包括任何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因为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先是适应生产力形式的一定社会制度,最终将转变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由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最活跃和最革命的因素,任何社会演进的轨迹都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任何民族和社会的兴衰过程其实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制度的演化也是从人类社会这个整体的宏观层次来把握和分析的,马克思认为在一个社会内部由于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这个矛盾的激化程度也是从该制度形成的初期到晚期而不断加重和变化的,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晚期,一个垄断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已显现,此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已非常尖锐。马克思从对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分析中,进而找出社会冲突的根源,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普遍存在的矛盾形式是导致社会整体对抗和阶级冲突的根源,而阶级斗争则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表面化,这样马克思就把社会演化深层次的内涵因素与表面现象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之,马克思从人类与自然界的矛盾出发,从生产力的发展导出了第一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从不同阶级的矛盾和利益出发,也就是说从社会关系中导出第二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在内的上层建筑(林岗、刘元春,2000)。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居于资源支配地位的阶级,总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分配格局,依靠自己的资源占有优势,建立起了政府和国家的强有力组织和法律制度,以及流行的文化意识形态。根据马克思对制度形成和演化过程的理解和解释,某一社会制度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就是对资源具有不同支配地位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冲突正是一定社会制度内在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该结果的内在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内在要求冲破原制度(社会生产关系)的束缚,这种阶级冲突的过程即革命的过程,就是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马克思将社会制度的演进置于生产力进步这个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首要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然后通过对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找出对资源具有不同支配地位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层次分明地将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社会制度演进过程,纳入到一个有机统一的制度演化理论体系。

## 二、转型研究中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 (一)把转型当作宏观经济变量的简单分析忽视其内在逻辑

经济体制转型是经济理论界面临的一个大课题。转型的发生使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从标准的价格与货币理论转向对产权和制度环境的研究。如何转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型?转型主要依靠政府来安排和推动,还是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等等,都是需要深入研究和不断反思的重要问题。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到目前为止,转型的理论研究还没有能形成一套得到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这主要是因为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转型(轨)理论,其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和产权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是在私有制下研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规律和效率,其对于如何从公有制转向私有制并没有过多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所给出的结论只能是快速私有化和加快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中,关注和研究转型问题的学者很多,如主流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ery Sachs)、阿斯琅德(Anders Aslund)、墨非(Kevin Murphy)、弗里曼(Roman Frydman)、莱

亚德(Layard, R.)、胡永泰(Woo, W.)、杨小凯(Yang, X.)、利普顿(Lipton, D.)、伯格(Berg, A.)、拉巴津斯基(Rapaczynski, A.)、鲍依科(Boycko, M.)等。他们大都认为,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原来的计划体制,如果在改革中不彻底摧毁中央计划体制,那么价格体系就仍得不到纠正,真正的市场机制也就不会真正形成,那么国内的矛盾和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同时,如果不彻底实行市场体制,那么就还会存在向计划体制回归的可能,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讲,要想彻底摧毁旧体制就必须实行彻底的激进式改革。

“华盛顿共识”可以看作是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对转型研究达成的共识,该共识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南美洲经验的催化下形成的。1989 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系统地分析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汇率、利率、外贸和外资的自由化,建立和强化私有产权的法制体系,强化预算硬约束、削减财政赤字等,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威廉姆森(1989)把“华盛顿共识”归结为 10 个方面,这 10 个方面包括:①平衡预算,严格控制预算赤字;②优化公共开支;③优化国民收入的再分配;④提倡资本市场自由化;⑤建立可变动的有竞争力的汇率体系;⑥走贸易自由化之路;⑦吸引外国投资;⑧推进国有部门的私有化;⑨政府放松管制;⑩明晰产权并保护私有产权。在该“共识”的指导下,一系列以稳定货币和宏观经济、迅速放开物价和市场、加快汇率改革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加快私有化进程、改革法律体系、税收体系、金融体系和政府设置等一系列改革快速推进。

根据“华盛顿共识”的原则,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试图通过稳定货币、放开市场和价格,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竞争的市场和富有活力的私有制经济。但这种转型的试验与中国的转型之路相比很快就证明是有害的和灾难性的,这种灾难性的结果可以从表 1 中看到。在“共识”原则的转型试验中,俄罗斯和东欧等转型国家大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经济衰退。

表 1:中国、俄罗斯和东欧的增长率(%)

国家	1986 - 1989 年	1990 年	1991 年	1992 年
中国	8.7	4.1	7.7	12.8
俄罗斯	2.4 <sup>⑥</sup>	-2.0	-9.0	-19.0
保加利亚	5.2	-11.6	-22.7	-7.9
捷克	1.6	-3.0	-15.5	-5.0
匈牙利	1.4	-4.0	-10.5	-4.6
波兰	2.7	-11.7	-7.7	-1.5
罗马尼亚	-0.9	-7.1	-13.4	-10.2

资料来源:Sachs and Woo 1994。

“华盛顿共识”其实体现了主流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逻辑,这里指的主流经济学家主要是指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和弗莱堡学派。他们大都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市场无疑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方式,通过一系列快速走向市场化的策略,转型国家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成功走向市场体制。但事实证明“华盛顿共识”在对转型的指导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现状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为转型而转型”的狭隘目标以及忽略增长取向的实现途径上。

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转型当作一个仅靠宏观经济变量分析就能解决的技术程序,这种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思路导致了在该理论指导下转型策略的失败。从目前“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sup>⑦</sup>到“北京共识”<sup>⑧</sup>的演变就很好地反映出了人们目前对转型的认识。转型的目的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转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获得经济增长和达到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如果忽略了转型目的是为了地更好地发展这一前提,而仅把私有化的推进程度、速度以及是否完全脱

离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作为衡量转型的主要依据,那就必然陷入/为转型而转型0的形而上学逻辑,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转型的认识和看法就是这种简单逻辑的体现。

## (二)颠倒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关系

科勒德克在 1998年完成的一部名为 5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6的专著中,对转型的内涵做出了更具体的界定,他把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限的经济变化和严格限制的政治变革;另一类是指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并逐步实现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向市场转轨。而由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三位教授共同撰写的 5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6也是一篇有代表性的转型研究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认为,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革。只有完成了宪政转轨,才能说是一种真正的转型。科尔内在美国 5经济学展望6杂志 2000年冬季号的长篇文章 5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6中提出了/体制的特殊品性0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制度(政治方面)变革成功才会实现和完成经济体制方面的转轨。他强调,/体制的特殊品性0是判定经济社会制度的标准,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会有不同的/体制的特殊品性0。转型必定是/品性0的改变。

在一个国家宪法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是不是一定不会发生经济体制的转型呢?虽然一个国家的宪法秩序和经济体制有紧密的相关关系,但宪法秩序和经济体制却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而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不同的经济体制则是可以和不同的国家和政体,即可以和不同的宪法秩序相结合,如资本主义可以和市场体制相结合,也可以和某种程度的计划体制相结合(如德国法西斯的中央计划体制和印度的中央计划体制等);而社会主义也是既可以搞计划体制(如目前的朝鲜、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搞市场体制(如中国和越南目前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起飞和经济快速发展时,其国家和政体也是一个独裁的政体,它们也不是西方学者所倡导的典型的政治民主和自由化市场体制相结合的理想范例,但它们也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他们正是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才逐步开展和推行政治民主和自由化的改革,他们和西方学者倡导的转型思路和指导方式也是完全相反的。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也告诉我们,在社会发展中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冲突正是一定社会制度内在利益矛盾激化的结果,该结果的内在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内在要求冲破原制度(社会生产关系)的束缚,这种生产力进步的过程即革命的过程,就是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马克思将社会制度的演进置于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导致社会生产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上层建筑的变化。这说明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发展观在揭示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方面比西方经济学的静态分析和僵化分析要有效得多。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揭示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这样马克思的社会演进理论必定是以增长取向为基础的,而中国转型之路的/北京共识0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生产力发展观基础上;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清晰地说明在社会转型中应该做到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在先,而宪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在后,中国经济转型的模式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 三、马克思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实证检验

矛盾激化决定转型方式的内在逻辑。在转型研究中,有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原计划体制国家原有体制的绩效状况和矛盾积累程度问题。由于不同国家原有计划体制的绩效状况和适用程度会影响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危机程度和矛盾冲突程度,也会进一步影响到人们对待转型的态度和看法。其实,任何激进与渐进的转型策略都是与一个国家原有体制下的绩效状况和矛盾积累程度相对应的,而不是都可以任意选择和相互比较的。

计划体制在时间变化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绩效下降的趋势,因此就会产生进一步变革的要

求。在计划体制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制度绩效呈现出递减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计划体制绩效递减规律。一般来说,计划体制在其形成和制定之初,其绩效是一条斜率为正的曲线,因为在制度磨合和发育的过程中制度边际报酬为正,但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和人们效用的变化而导致制度滞后程度逐渐加剧,制度绩效的边际报酬就会递减,制度绩效曲线达到其斜率为零的点之后就会呈现出向下弯曲的趋势。并且制度递减的趋势在达到某个阶段后会进一步加剧,因此,向下倾斜的曲线会变得更加陡峭。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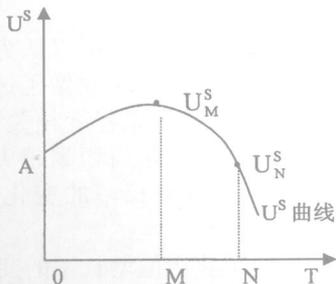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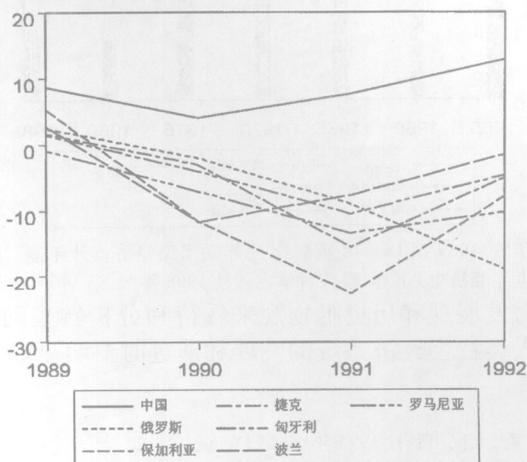


图1 计划体制绩效曲线变化图

在图1中,纵轴为制度绩效函数  $U^S$ ,横轴为时间,  $M$  和  $N$  分别为表示制度绩效曲线变化的两个重要时间点,  $M$  点为制度绩效的边际变化由正为负的转折点,在  $0$  至  $M$  时刻制度绩效边际报酬为正,  $M$  点之后则为负,即存在  $dU^S/dt < 0$ 。当达到  $N$  点后,制度绩效会加速递减,这就是说当达到  $N$  点后,制度的无效程度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会加剧,即存在  $d(dU^S/dt)/d^2t < 0$ 。图2的制度绩效曲线可以直观地刻画出计划体制的绩效递减规律。

图2 中国、俄罗斯和东欧的增长率(%)



数据来源:萨克斯和吴永泰(Sachs and Woo 1994),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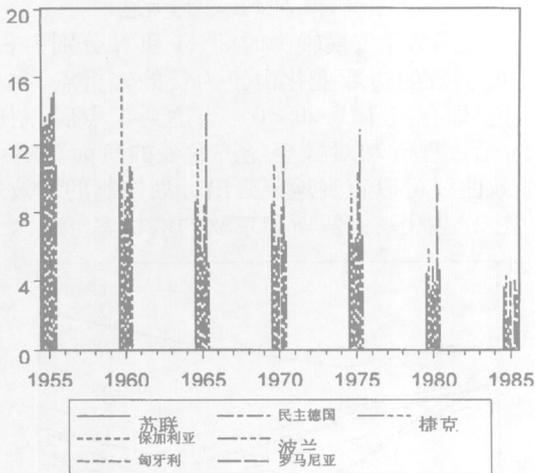
一般来说,转型的激进程度取决于转型实施时原有体制的矛盾积累程度。如在图2中,中国改革后至1989年的平均增长率为8.7%,而俄罗斯、捷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平均增长率都不足3%,这也说明在这些国家原有制度的矛盾已到了激化的程度,而中国持续的高增长也说明了中国原有制度的矛盾不突出,也就没有采取相对激进转型策略的内在要求和必要。1989年随着波兰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商品短缺,通货膨胀严重,国内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之时,在西方市场国家利诱和鼓动下,波兰马上就采取了激进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策略。此后,1991年,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采取了激进的转型方法(这些国家在采取激进转型时经济增长已为负数,如捷克1990年经济增长率为-3.0%,保加利亚为-11.6%)。1992年俄罗斯也选择了休克疗法(俄罗斯1990年经济增长率为-2.0,1991年为-9.0)。这些国家之所

以采取激进转型策略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国内矛盾激化,而改革的延误成本非常大,这个时候渐进改革带来的好处不足以补偿改革延误带来的社会弊端的增加,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国家采取相对激进的转型策略也是这个时候合理的选择。

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方式取决于社会各级主体对新制度的预期效用变化和在利益驱使下所表现出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积累程度。人们对新制度预期效用的变化又是导致各级制度变迁主体冲突和矛盾的主要根源。转型和改革的激进程度取决于原计划体制内部的矛盾积累程度。

转型取决于原制度体制下的矛盾积累程度,转型可以认为是在这些国家的矛盾作用下展开的,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发展观对此做了透彻的分析。而转型中的激进与渐进策略其实也与转型国家开始转型时的矛盾积累程度相关,如可以用工业产值增长率的变化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矛盾积累程度,一个国家的矛盾积累越尖锐,其工业产值增长率变越低,甚至为负增长,如前经互会成员国<sup>①</sup>工业产值增长率的变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见图 3<sup>②</sup>。

图 3 前经互会成员国工业产值增长率的变化(年均,%)



数据来源:根据《经互会统计年鉴》1989 第 18-48 页数字、《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1990 年第 674 页数字整理计算。见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46-147 页。

所以,用马克思生产力发展观和历史唯物观来看待和分析转型问题还是非常适用和贴切的,马克思的理论在揭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和演进时要明显好于西方经济学。

####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 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98 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33 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35-336 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 页。

⑥为前苏联的增长率。

⑦在“华盛顿共识”逐步走入死胡同的同时,一系列批评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Stiglitz 首先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的概念,他在一系列重要论著与演讲中批评不顾社会不满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号召超越“华盛顿共识”走向“后华盛顿共识”(Stiglitz, 2001, 2004)。此后,美国经济学家 Narayan Ramachandran 认为处于发展中的转型国家应该以“三 G”政策所取代“华盛顿共识”, Ramachandran 概括的“三 G”策略主要是指转型国家的“可持续增长”(get growth going)策略。这样在后来形成的“后华盛顿共识”中,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成为了很重要的一条原则。

⑧2004 年 5 月初,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 Jashua Cooper Ramo 的一篇“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的论文,提出当代经济发展的“北京共识”概念。论文对中国 20 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

改善人民生活活可效仿的成功榜样(Ramo,2004)。此后,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正面肯定,就成了国际主流媒体的一个引人关注的动向。

⑨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4月号、5月号和6月号分三期连载。

⑩“体制的特殊品性”具体表现是指:(1)政治力量特征;(2)产权的分配特征;(3)协调机制特征;(4)经济行为者的典型特征;(5)经济运行特征。它们之间的顺序决定的关系(1)→(2)→(3)→(4)→(5)。

⑪见 Janos Kornai, 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 no. 1, Winter 2000, pp. 22 - 27,

⑫前经互会成员国是指以苏联为主的包括一些东欧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国家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一种经济互惠组织。这些国家主要包括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

⑬本表摘选于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147页。

####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马克思:《资本论》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5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26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94页。

林岗:《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研究》,北京:求实出版社1986年版。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68页、225-226页。

林岗、张宇:《马克思主义与制度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61-63、353-358页。

刘忠世:《结构与过程: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总体构成》,《现代哲学》2001年第4期,第38-46页。

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2-147页。

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247页。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5页、613页。

林毅夫 蔡昉 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下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148页。

张军:《中国过渡经济导论》,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靳涛:《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演进与理性:20世纪两次逆向转型的比较研究及理论反思》,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8页。

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转引于张宇:《过渡政治经济学导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科尔奈:《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思索》,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0页。

周冰、靳涛:《制度滞后与变革时机》,《财经科学》2005年第3期。

周冰、靳涛:《第一位制度经济学家: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2003打印稿。

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拉迪:《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Martin Raiser, Lessons for from Whom?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in China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cs & Transformation*, vol. 7, No. 2, 1995.

Jeffrey Sachs and Wing Thyé Woo, Structural Factor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Former Soviet Union, *Economic Policy* 18, April 1994.

Williamson, J. :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Chapter 2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John Williamson (ed.), 1990,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Sachs J.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The American Economist*, 1992, 36(2): 3 - 11.

Che, Jiahua, and Yingyi Qi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Community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Understanding China's Township - Village Enterprise", 1998a,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4(1), pp. 1 - 23.

Qian, Y. and C. Xu,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N - 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 - State Sector," *Journal of Economic Transition*, 1993, 1: pp. 135 - 160.

Woo, Wing Thyé, "The Real Reasons for China's Growth", *The China Journal*, 1999, No. 41, pp. 115 - 138.

Kornai: "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 Volume 14. Number 1. winter 2000.

36. Janos Kornai, What 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 no. 1, Winter 2000, pp. 22 - 27,

Stiglitz, J. E. ,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 the Post - Washington Consensus, the 1998 WIDER Annual Lecture, Helsinki, January 1998, reprinted Chapter 1 in *The Rebel Within*, Ha - Joon Chang (ed.), London: Wimbledon Publishing Company, pp. 17 - 56, 1998.

Jashua Cooper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Printed report, 3 - 7, 2004.

Woo, Wing Thyé, The Real Reasons for China's Growth, *The China Journal*, 1999, No. 41, pp. 115 - 138.

Hoff, K. and J. E. Stiglitz , After the Big Bang? Obstacles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Rule of Law in Post - Communist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 (3), June 2004, 753 - 763, 2004.